

文化生态学视角下洞庭湖区龙舟文化的空间生产与 共同体意识建构

郭振华 袁安发 郭梦瑶 黄小倩

吉首大学体育科学学院 湖南 吉首 416000

【摘要】：本研究融合文化生态学与空间生产理论，以洞庭湖区汨罗龙舟文化为个案，考察其空间生产实践与共同体意识建构逻辑。研究发现，龙舟文化通过具身实践、反思认知与创新反哺，实现物质空间、象征空间与生活空间的动态重构与意义再生产；情感能量集聚、社会边界流动、多元主体协商共治与文化记忆具身传递，构成空间生产与共同体意识互构的核心机制。龙舟文化的存续本质上是文化系统在社会生态变迁中的适应性调适，呈现“核心稳定、边缘流动”的生态特征。研究为民俗体育文化的现代传承提供了内生性路径，并揭示了地方性、国家性与文化主体性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复杂互动。

【关键词】：文化生态学；空间生产；共同体意识；洞庭湖区；龙舟文化

DOI:10.12417/3041-0630.26.11.042

引言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洞庭湖区龙舟文化作为承载屈原爱国主义精神与湘楚文化精髓的典型载体，深刻体现了中华民族“团结奋进、求索不息”的精神特质，是连接历史记忆、地域认同与当代价值的重要纽带。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战略背景下，这一民俗体育实践正成为弘扬民族精神、凝聚社区共识、促进地方发展的重要文化资源。然而，现代化进程中，洞庭湖区龙舟文化面临复合性挑战。全球化与城镇化导致文化实践空间形态趋于同质化，传统水域仪式场域被标准化设施取代，地方性特质面临消解风险；社会结构变迁与人口流动削弱了传统宗族与地缘纽带，传承的内生动力出现松动。既有研究多聚焦于民俗事象描述或困境罗列，未能从文化生态系统整体视角深入剖析龙舟文化在变迁环境中的适应性调适及其对共同体意识的重塑作用。文化生态学理论为理解龙舟文化提供了动态、整体的分析框架。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指出，空间是经由社会关系与实践不断被生产与重构的产物^[1]。整合两种视角，本文将龙舟文化视为根植于洞庭湖自然—社会生态、通过周期性仪式实

践与日常互动不断进行“空间再生产”与“认同再建构”的能动过程，旨在揭示其作为复杂适应系统的运行机制，为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提供学理支持。

1 文化生态学视域下龙舟文化的适应性系统建构

1.1 自然生态基础：水域生计与节律性适应的耦合

龙舟文化的物质载体与仪式时序，其实很难脱离洞庭湖区

具体的自然节律来理解。宽阔的水面固然为竞渡提供了最直接的物理舞台，但更值得注意的是，端午节恰逢丰水期，这一时间节点既便于大规模人群聚集，也恰好嵌入农耕社会年中难得的农闲间歇。而龙舟的技术细节与信仰仪轨，则处处可见湖区“水域生计”的日常影子——船型与划桨手法，与渔民、船夫的劳作经验一脉相通；“祭龙头”“拜水神”之类的仪式行为，则折射出人们面对变幻莫测的水力时那种既依赖又敬畏的复杂心态。可以说，正是这种与自然周期、生产节奏的深度咬合，赋予了龙舟文化最初也最坚实的生态合法性。

1.2 社会生态网络：血缘地缘纽带中的竞争与合作均衡

龙舟的组织与传承，向来不是悬浮于社会之上的文化表演，而是深深嵌入地方社会的血缘与地缘肌理之中。传统上，龙舟多以宗族为单位打造，一条船往往就是一个房支或村落的“脸面”，承载着实实在在的声望诉求。竞渡场上的激烈对抗固然引人注目，但有趣的是，这种竞争从来都被一套不成文的规矩和仪式所包裹，最终反倒促成了社会关系的周期性紧张与周期性修复，形成一种颇有意味的动态平衡。与此同时，活动筹备几乎离不开社区内部的广泛协作，这种协作又在无形中加固了成员之间的互助纽带与归属感。若从一个更宏观的视角看，龙舟文化实践实际上扮演着传统乡村社会生态的“调节器”与“强化剂”——它在竞争与合作的张力中，维系着地方社会结构的韧性与活力。

1.3 现代变迁中的适应性调适：系统韧性的当代展现

面对现代化浪潮的冲刷，龙舟文化系统并未固守成规，而

作者简介：郭振华（1968~），男，博士，教授。研究方向：民族传统体育历史与文化。

基金项目：（1）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编号：25ZDB024,25YBA262,25YBQ162,25YBQ161；（2）湖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项目，编号：24B0490,25C0315,25A0384；（3）湖南省普通本科高校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编号：202502000869,202502000895。

是展示出颇为可观的适应性调适能力。组织形态上,已从单一的“血缘宗族主导”渐次走向血缘、地缘与趣缘的多元共生;功能定位上,则从偏重信仰祭祀和内部整合,延伸至体育竞技、文化旅游、社区健身乃至教育传承等多重维度。值得注意的是,在国家战略话语的引导下,龙舟文化中所蕴含的爱国主义与集体主义精神被进一步凸显,使其顺利接入主流价值叙事,获得新的身份认同。所有这些调整,在我看来,并非被动的应付,而是一种主动寻求新“生态位”的策略性尝试,恰可视为龙舟文化系统韧性在当代最生动的注脚。

2 洞庭湖区龙舟文化的空间生产实践

2.1 物质性空间实践：从自然水域到复合景观的适应性构建

传统龙舟实践的核心在于周期性地激活贯穿历史记忆与信仰的神圣地理轴线。从“河泊潭”到“回龙门”,自然水域被建构为充满神性色彩的空间。每年端午,从屈子祠“朝庙”到江畔“点睛”下水,仪式串联祠庙、街巷与江岸,将静态遗址转化为流动剧场,年复一年铭刻空间的集体记忆与神圣属性。现代性的介入催生了物质空间的重大转型。标准化赛道与现代化设施将自然河道转变为可承办国际赛事的体育—旅游复合景观,空间职能从内向的社区整合转向对外的形象展示与经济驱动。面对城镇化与生活节奏变化,龙舟文化通过创造替代性空间维系传承—村落河埠仍是核心训练场,“旱地龙舟”、学校操场练习、健身房训练等替代性空间被广泛采用,体现了文化主体对实践场域的灵活调适。

2.2 象征性空间表征：符号竞争、意义重构与认同再生产

在传统乡土社会,龙舟是宗族在公共空间中最具象的旗帜。以姓氏冠名、以颜色区分的龙舟是移动的宗族标识,“晒桡”“包头”等行是宗族间荣誉竞争的戏剧性展演,不断再生产着基于血缘的排他性社会边界与内部凝聚力。当代龙舟的符号意义经历了深刻的国家化整合。屈原爱国主义精神被有意识地提炼为核心叙事,龙舟竞渡被界定为弘扬民族精神的载体,龙身漆有时代标语,开幕式融入主流文艺表演,将地方性仪式嵌套进民族—国家宏大叙事,龙舟符号升维为“中华文化”的国家象征^[2]。同时,传统“女子不触龙舟”的禁忌被打破,女子龙舟队的成立与活跃重构了象征空间,使其从封闭的男性宗族领地转变为彰显性别平等与现代公民参与的新文化场域。

2.3 生活化再现空间：记忆编织、数字延展与制度浸润

龙舟文化最深层的生命力在于其渗透到日常生活肌理中。“凑份子”的集资行为超越经济意义,成为确认社区成员身份与责任的仪式;“龙舟宴”消解竞争张力、重申社区团结;外嫁女“辞端阳”回娘家观赛强化姻亲网络,将节庆空间转化为巩固社会联结的年度仪式。新媒体技术催生了虚拟空间生产,短视频的记录与传播实现文化数字存档,流动人口通过直播观

看家乡赛事,在虚拟空间中维系地域认同与文化归属感。龙舟文化通过“非遗进校园”、高校课程开设、研学活动等方式嵌入国民教育体系,使年轻一代在规范化场景中接触并内化龙舟文化,保障文化记忆的代际传递。

3 空间生产与共同体意识的互构机制

3.1 情感能量的集聚与仪式团结的生成

龙舟竞渡是典型的情感能量生产与转化仪式。“朝庙”仪式奠定集体情感的神圣维度;竞渡高潮阶段,鼓点统一节奏、呐喊与划桨实现身体同步,集体兴奋达到峰值。这种基于共同经历的情感体验在周期性重复中积淀为对文化共同体深沉而持久的情感依恋。屈子祠、回龙门、古码头等空间因承载高强度集体仪式而成为“情感地标”与“记忆之场”,即便在日常时间也持续唤起集体记忆,使共同体意识得以隐性而持久地延续。

3.2 边界的确立、流动与认同的层级化

传统龙舟文化中宗族是认同核心单元,血缘边界清晰且具排他性。现代城镇化与人口流动使其逐渐软化,代之以地缘边界与趣缘边界,共同体从封闭系统转向“有限开放”系统。龙舟竞渡制造和展演竞争性边界,但被嵌套在共享仪式框架之内—统一规则确保公平,共同纪念仪式提供精神共识,赛后“龙舟宴”构成必要社交礼仪。激烈对抗通过“仪式性冲突”激活次级群体凝聚力,最终在共享地域文化自豪感中升华至“地域文化共同体”认同^[3]。最具张力的是从地方性向国家性文化符号的跃升:龙舟被表述为弘扬民族精神的载体,参与者被整合进“中华民族”的“想象的共同体”之中^[4],实现认同尺度的重大拓展。

3.3 主体能动性的实践与共同体权力的动态再生产

青年群体运用数字技术创新活动传播与组织模式,当创新实践获得官方关注与社区好评时积累为“文化资本”,逐渐赢得表述权与决策权,推动传承主体从“长老权威”向“代际共治”演变。地方政府通过投资兴建竞渡中心、制定竞赛规程、筹办大型节庆等制度性行动,为龙舟文化赋予多重合法性,但也重塑了活动组织逻辑与目标取向。代表传统的地方长老、技艺传承人则以对“本真性”的坚持发挥制衡作用,通过协商仪式细节、抵制过度商业化等方式调节变革方向。多方主体的持续对话、博弈与妥协,构成了共同体权力边界与运行规则被不断再确认的微观政治过程。

3.4 文化记忆的空间锚定与代际传递

龙舟文化通过“空间—身体”双轨传承机制实现记忆的跨代传递。物质空间—屈子祠碑刻、老码头石阶、龙舟龙骨痕迹—是承载历史叙事的“记忆文本”。仪式化空间中的情境体验

更至关重要：孩童置身端午竞渡现场，古老民谚在码头边被反复提及，乡土认同与集体荣誉感通过情境浸染刻入个体生命经验。具身化实践则是记忆内化的关键途径——青少年从围观者到参与者再到主力队员的角色递进，通过亲身参与将仪式知识、划桨技巧、协作节奏逐步“书写”进身体。水流感知、鼓点与动作同步的集体亢奋、肌肉的紧张与释放，这些“身体感”与“肌肉记忆”构成最深层稳固的“具身化文化基因”，确保文化精神内核在代际间活态传递。

4 从空间再生产到文化生态系统：一种文化生态学的辩证理解

4.1 核心确定与边缘流动：文化内核的生态韧性

龙舟文化的核心生态位，大致可以归结为两点：一则以水体空间为依托的周期性集体仪式实践，二则经由这些实践所凝聚、以屈原爱国精神和同舟共济为象征的共同体情感与价值认同。与之相对，其边缘生态带则表现出相当高的流动性——组织形态从宗族到趣缘团体，技术载体从木舟到碳纤维艇，符号表达从宗族徽帜到国家标语，无一不随着社会环境的更迭而不断调适。这种“核心—边缘”的动态结构，恰好使得文化系统在承受外部压力时，既能守住认同的连续性，又可以通过边缘要素的不断重组来开辟新的生存空间。

4.2 多元主体的共生与博弈：文化场域的生态平衡

龙舟文化场域本身就是一个微型文化生态系统，其中活跃着在地村民、青年传承者、政府、市场、媒体与学术界等多元行动者。这些力量之间既有共生互惠的一面，也难免存在内在张力——商业资本有可能侵蚀仪式的神圣性，行政规划可能挤压民间自发的弹性空间，而现代标准化也可能削弱地方性技艺

的多样性。问题的要害在于，能否形成一套有效的“生态调节机制”，例如基于地方共识的非正式规范、政策引导下的协商平台，以及学术与媒体的批判性反思，用以防止某一方力量过度膨胀而打破整体平衡。

4.3 空间作为媒介：文化能量流动与转化的生态通道

空间在此并不仅仅是一个物理容器，而是情感、记忆、象征资本与经济资源等文化能量得以流动、转化和循环的关键媒介。具体而言，自然空间供给着生物性与神圣性的能量；社会空间则承载着情感能量与社交资本的集中生产与交换；表征空间则将地方性文化能量转化为可广泛传播的符号资本与经济资本，同时从更大的系统汲取政策支持与外部认同^[5]。一个健康的民俗文化生态系统，其内部空间网络必须保持足够的开放性与连通性，才能使本土实践与更宏大的语境之间实现持续的能量交换。

4.4 系统维系与活力激发：文化生态保育的实践指向

基于上述辩证理解，龙舟文化的传承发展应转向“文化生态保育”的系统性思路。其一，辨识并锚定文化精神内核、核心仪式与基本社会功能，以立法、村规民约及教育传承予以稳固。其二，构建“政府引导、社区主责、社会参与、专业支撑”的多元共治调节机制，搭建制度化协商平台。其三，维护空间网络健康与开放：保护自然水域、祠庙等物质空间，同时支持数字化传播、创新工坊等新型空间生产。其四，激发传承主体内生能动性，通过专项扶持、代际对话、荣誉激励等方式鼓励其在深刻文化体认基础上创新反哺。民俗文化的现代化是文化主体主动寻求“系统再适应”的辩证过程，其核心在于通过科学保育维系文化内在活力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动态平衡。

参考文献：

- [1] 秦锋砾.智慧城市建设的空间逻辑及正义保障——以亨利·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为出发点[J].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3):5-13..
- [2] 罗湘林,刘亚云,谢玉.从故事到赛事——汨罗龙舟竞渡的底层视角[J].体育与科学,2015,36(01):81—85
- [3] 谢玉,罗湘林,何斌.汨罗江龙舟竞渡探析[J].体育文化导刊,2012,(08):29-32.
- [4] 安德森 B.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M].吴叡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7.
- [5] 兰德尔·柯林斯.互动仪式链[M].林聚任,王鹏,宋丽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263.